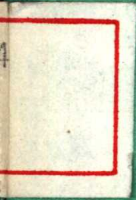




徐远和 著

理学与 元代社会

人 民 大 学 社



徐远和 著

理学与 元代社会

人民出版社

封面设计：金 朔
责任编辑：王 粤

理学与元代社会

LIXUE YU YUANDAI SHEHUI

徐远和 著

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东光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8印张 190,000字

1992年10月第1版 1992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1,200

ISBN 7-01-001208-3, B·151 定价 4.45元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元初理学的传播者	13
第一节 赵复——道北第一人	13
一、传道论统绪 师友讲私淑	14
二、发挥伊洛学 希贤自砥砺	18
第二节 郝经——南北方理学的早期汇合者	21
一、一道贯万物 演化皆有序	22
二、六经自有史 所载惟一理	30
三、“夷狄”主华夏 理当行汉法	34
第二章 鲁斋学派	40
第一节 许衡——元代理学宗师	40
一、道立太极前 心藏万物理	42
二、变通有常理 度数不可逾	46
三、致知须格物 知行当并进	50
四、人性由气禀 明德随分数	55
五、尽心教胄子 育才为国用	60
六、“夷”夏以道名 地类非所系	64
第二节 鲁斋学派传人	67
一、姚燧——元代文学宗匠	67
二、耶律有尚——许衡式教育家	74
第三章 静修学派	78
第一节 刘因——元代北方理学重镇	78
一、读书讲次第 治学采众长	80
二、物理本对待 生气常相将	83

三、主道以观物 不齐物自平	88
四、圣贤皆可期 其要在无欲	91
第二节 静修学派传人	94
一、安熙——刘因私淑弟子	94
二、苏天爵——刘因再传弟子	97
第四章 草庐学派	103
第一节 吴澄——元代南方理学重镇	103
一、著说阐道统 贞下复起元	104
二、五经立纂言 易学尚象数	105
三、为学重性理 讲论舒己意	111
四、宗朱反默守 兼陆破门墙	120
第二节 草庐学派传人	125
一、元明善——吴澄经学的崇拜者	125
二、虞集——吴澄理学的捍卫者	126
第五章 北山学派	134
第一节 何基——北山学派的首席	134
第二节 王柏——北山学派的宗师	139
一、胸怀经世志 意存治安策	139
二、学术绍程朱 修养期圣贤	142
三、经传皆可疑 按理以复古	146
第三节 金履祥——元代北山学派的朱学干城	150
一、宗朱疏四书 治史贯六经	150
二、探源言理一 析流究万殊	154
三、认知尚格致 践履一知行	158
第四节 许谦——元代北山学派的朱学大师	163
一、理气贯宇宙 万物禀天命	164
二、用功止物欲 磨莹廓气禀	167
三、格物求知言 集义存浩气	171
四、群经备圣心 丛说翼朱学	175
第六章 徽州学派	179
第一节 郑玉——元代后期理学的重要代表	179

一、春秋阐微旨 阙疑俟后学	180
二、用心求本原 立诚赞化育	185
三、治道主伦常 出处重节义	189
四、宗朱莫毁陆 求同可存异	193
第二节 赵沅——元季《春秋》学翹楚	196
一、深究春秋教 直追圣贤心	197
二、研析周易理 寻绎天人观	206
三、拳拳辨朱陆 恳恳尚易简	211
第七章 元代陆学	215
第一节 刘埙——元初陆学代表者	215
一、立道统遗论 证朱陆合辙	216
二、尚陆学本心 论虚实互形	222
三、体妙悟境界 绎思维理论	227
第二节 陈苑——元代江西陆学传人	232
第三节 赵偕——元代浙江陆学传人	235
第四节 危素——元季陆学踵武者	239
结 语 元代理学的社会作用与历史地位	246

绪 论

兴起于漠北的蒙古游牧民族，经过长期的征服战争，相继灭亡了西夏、金、吐蕃、大理和南宋，结束了中国长期分裂的局面，建立了统一的全国政权。

蒙古贵族依靠军事旋风所征服的中原汉地，是一个具有高度文明的地域和优秀传统文化的先进民族。而历史发展的一条永恒规律是：“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①蒙古贵族统治者征服中原汉地以后，不得不与汉族地主阶级结成联盟，采用中国传统的统治方式，建立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权。它是蒙古贵族与汉族地主阶级联合专政的中央政权。而在意识形态上则采用儒家文化的新形态——理学作为思想统治的工具。

在元代，理学的传播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大体说来，元代理学的发展可划分为三个时期：元灭宋以前，为理学的传播期；自元灭宋至英宗新政前后为理学学派形成期；自泰定帝至元朝灭亡，为理学发展停滞期。

元代理学的肇兴，可以追溯至金元之际。

宋室南渡以后，原本创始于北宋的理学随之南播，在南方久盛不衰，并由朱熹集其大成。相反，理学在北方却一蹶不振。金代，王安石的新学较为流行，元好问说过：“国初经术，祖金陵之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0页。

余波”（《屏山鸣道集说略》引，《宋元学案》卷一百）；苏轼的蜀学也受到推崇。而理学，在金代几乎无人问津。“苏学行于北，洛学行于南”，这句话就是当时学术思想界状况的写照。直至金元之际，北方理学思潮才重新抬头。

金元之际理学在北方兴起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金人统治下的北方中原地区，社会经济、文化都有相当的发展。特别是汉族士人，由于长期受中原传统文化的熏陶，比较容易接受较高形态的文化思想。理学是儒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是充分哲理化了的儒学思想体系，它为北方汉族知识分子和代金而起的蒙古族统治者所理解、接受，乃是必然的。

具体说来，金元之际北方理学的传播和发展，有以下几个直接原因：

首先是洛学的余绪未绝。

洛学的创始人程颢、程颐曾在伊洛等地兴办学校，教授生徒，播下理学的种子。元初著名理学家刘因在叙述泽州（今山西晋城）理学的渊源时说：“初，泽俗淳朴，民不知学。至宋治平中，明道程先生（颢）为晋城三年，诸乡皆立校，暇时亲至，为儿童所读书句读。择其秀异者，为置学舍、粮具而亲教之。去邑才十余年，服儒服者已数百人。由是尽宋与金，泽恒号称多士。”（《段直墓碑铭》，《静修集》卷一六）泽州儒学（理学），其源盖出于程颢。而且，在宋、金两代，这个地区的二程之学一直没有断绝过。虽然二程的著名弟子多流寓南方，但仍有一些弟子在北方活动。号称“元初理学名臣”的郝经，也曾描述过理学在北方流传的情形。他说，其先世，“高曾而上，亦及（程）先生之门，以为家学。传六世至经，奉承余绪，弗敢失坠。”（《两宋先生祠堂记》，《陵川文集》卷二七）郝经的“家学”源于二程，至其曾叔父东轩老，曾以二程之学“教授乡曲”（《陵川文集》朱樟序）。金末学者李俊民亦得

河南程氏传授之学，“廷冠多士，退而不仕，教授乡曲，故（程）先生之学复盛”（同上）。据《元史》记载，当李俊民以所学教授乡里时，“从之者甚盛，至有不远千里而来者。”（《李俊民传》，《元史》卷一五八）可见，洛学在北方并未绝迹，始终绵延不绝，其中也不乏“潜心伊洛之学”的知识分子。只不过在长时期内，洛学不为时尚所好，不属于显学，多以“家学”形式世代流传，直至金末才趋于“复盛”，呈现出发展的趋势。

其次是朱熹理学在金代的零星北传。

宋、金对峙，南北隔绝，正常的学术文化交流难于进行。但是，到了南宋后期，由朱熹集大成的理学获得了朝廷的承认，在思想界的地位日益提高。这时，朱熹学说也通过一些偶然的机会，开始零星传入中原地区。传播的途径大致有两条：

一条途径是宋、金双方信使往还，使朱熹著作稍稍传入北方。元人许有壬为我们提供了南宋使者挟带朱熹著作至金而为金人所获的具体事例。他说：“理学至宋始明，宋季得朱子而大明。前辈言，天限南北时，宋行人篋四书至金，一朝士得之，时出论说。闻者竦谓其学问超诣。”（《性理一贯集序》，《至正集》卷三三）这里所说的《四书》，无疑是指朱熹的《四书集注》。而获此《四书》者据以“论说”，竟被人认为“其学问超诣”。金人刘祁、元好问则为我们提供了金朝使者受朱熹学说影响并加以传习的具体事例。刘祁说：“王渥仲泽，……因使宋至扬州，应对华敏，宋人重之。回为太学助教，充枢密院经历官。……博学，无所不通。长于谈论，使人听之忘倦。”（《归潜志》卷三）这位曾经出使南宋的王渥，到底传授的是何种学问？刘祁没有说。元好问为我们解开了这个谜。他说：王渥认为陈彝（字良佐，小字陈和尚，金末名将）“有可进之资，示之新安朱氏《小学》书，使知践履之实。”（《陈良佐碑》，《遗山集》卷二七）王渥授以朱熹《小学》之书的陈彝，于公元1232

年蒙军陷钧州时，诣蒙军牙帐，大骂不止，受刑而死。陈彝在国难当头时，以身殉职，可以说是实行了乃师所授“践履”之学。

另一条途径是金末汉族知识分子因战乱避居宋地，从而获得传习朱熹理学的机会。《元史·窦默传》记述：“金主迁蔡，（窦）默恐兵且至，又走德安（今湖北安陆、云梦、孝感等县）。孝感令谢宪子以伊洛性理之书授之。默自以为昔未尝学，而学自此始”。

（《元史》卷一五八）窦默避居宋地学得理学之后，适逢蒙军中汉人将领杨惟中奉旨招集儒、释、道之士，乃北归，隐于大名，后得与传习赵复理学的姚枢、许衡等人相互切磋，成为金元之际在北方传播理学的重要人物之一。

在金代，朱熹理学通过上述途径零星传入北方，在一部分人士中间产生了反响，有的奇其“学问超诣”，有的躬行践履，有的潜心研治，预示着北方理学思潮即将兴起。

再次是金末学术空气沉闷。

金代学术，以佛学最为盛行。不少学者崇佛佞佛，乃至站在佛学立场上攻击宋儒辟佛。还有的提倡“三教合一”，出入于儒、佛之门，调和儒佛之争。加之金朝取士，止以词赋、经义学，当时士风所尚，仍是传统的辞章之学，一味蹈袭前人，而不敢逾越雷池，缺乏创新精神，学术空气异常沉闷。这种状况，招致一部分进步知识分子的强烈不满。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开始转而对理学发生兴趣。例如，金正大（1224—1231）年间，青年知识分子王郁，乃一布衣少年，鉴于佛老为害，“尝欲著书，推明孔氏之心学”。他谈论经学，则以宋儒见解为最高，并且曾想“取韩、柳之辞，程、张之理，合而为一”（《归潜志》卷三）。只是由于战乱中被杀，未能付诸实行。又如，金末儒士徐之纲，初为词赋之学，久而悟其非，乃“以河南二程、江南朱（熹）张（栻）胡（安国）蔡（沈）为根底，穷《春秋》、《易》二经”（袁桷：《滕县尉徐君墓志

铭》，《清容居士集》卷二九）。这些事实透露出，金末一部分人开始趋向程朱理学。

受这种思潮的影响与刺激，金末一些有声望的人士也开始研究程朱理学。金末著名文人李纯甫酷爱佛学，尝曰：“学至于佛则无所学。”他在《鸣道集说》中，对于北宋的司马光、二程以至南宋的朱熹、杨时中等理学家，一概加以攻讦。故而全祖望说，李纯甫“所著《鸣道集说》一书，濂、洛以来，无不遭其掎击。”（《屏山鸣道集说略》，《宋元学案》卷一百）李纯甫攻击的目标集中在宋儒辟佛这一点上，因此，他又“大为诸儒所攻”（《归潜志》卷九）。李纯甫站在佛学立场上批判理学，遭到学术界的反对，这从另一方面反映了金末理学兴起的状况。

晚金大儒赵秉文从李纯甫那里接受了教训，佞佛的立场有所改变。刘祁说，赵秉文“本喜佛学，然方之屏山（李纯甫），颇畏士论，又欲得扶教传道之名，晚年，自择其文，凡主张佛老二家者皆削去。”（同上）就是这位赵秉文，在《性道教说》一文中，声称：“孟子之后，不得其传。独周程二夫子，绍千古之绝学，发前圣之秘奥，教人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求之，以戒慎恐惧于不见不闻，为入道之要。此前圣之所未到，其最优乎？”（《屏山鸣道集说略》，《宋元学案》卷一百）这简直已是理学家的路子了。然而，他又说：“道学之蔽，亦有以中为正位，仁为种性，流为佛老而不自知。其蔽反有甚于传注之学。”（同上）这里的“道学之蔽”，显然是针对二程后学说的。难怪全祖望评论说：“此章最断得平允，尽宋人之得失。”（同上）赵秉文已能尽宋人理学（道学）之得失，对于理学在北方的传播及其发展方向，无疑有重大影响。金末元初的北方儒士，都力图既取宋人理学之所长，而又避其所短。

但是，这一切尚只是为理学在北方大规模传播准备了条件。我们可以蒙古灭金为界，把理学的传播从金末到元灭宋之前分为

两个阶段。前一阶段金元之际，是理学北传的前奏；而后一阶段宋元之际，才是正式的理学北传期。

宋元之际，理学在北方的传播具有与金元之际不同的特点。公元1235年，元军攻陷德安，大肆屠城。其时，北方学者姚枢奉命随汉人将领杨惟中在军前供职，负责网罗人才。姚枢从俘虏中救出南宋理学家赵复，送至燕京。此乃北方理学发展史上的一大转机。赵复在北方开创了理学的新局面。首先，赵复把程朱理学著作系统地介绍给北方学者。《元史·赵复传》说：“先是，南北道绝，载籍不相通；至是，复以所记程、朱所著诸经传注，尽录以付枢。”（《元史》卷一八九）姚枢得到赵复所传程朱之书，如获至宝。后来，当他隐居苏门时，曾刻赵复所授小学四书并诸经传注，以惠学者；又与其他学者合作，以赵复所授诸经传注，分为二十八类，修纂成《五经要语》，广为刊行。由是北方学者皆得程朱之书而尊信之。第二，赵复开北方书院讲学之风，书院制度始于北宋，而南宋滋盛。但宋代书院是私立学校性质。赵复至燕以后，杨惟中与姚枢所建立的太极书院，则带有半官方性质。赵复即以此书院为讲坛，公开讲授程朱理学。太极书院成为元代国立学校性质的书院制度的滥觞。第三，赵复开始建立理学师承授受体系。赵复游学北方，吸引了一批学子从游。姚燧说：“（赵复）至燕，名益大著。北方经学实赖鸣之。游其门者将百人，多达材其间。”（《序江汉先生事实》，《牧庵集》卷四）这种声势是前所未有的。赵复开始在北方建立起理学的师承授受体系，从而为进一步形成独立的北方理学学派奠定了基础。

理学在元统治区域的传播，给北方具有遗金学风的知识界吹进了一股新鲜的学术空气。程朱理学摒弃旧的辞章之学，主张直接从儒家经典中领会古圣贤的本意。尤其是理学家自称直溯孔孟，接续了自孟子以后中断千余年的道统，以传道自任，无疑具有革

新精神。理学是以儒学为主干，融合了释、道哲学的某些成分而形成的一种新儒学思想体系，比传统的儒学具有强大得多的生命力。因而，它一旦在异族长期统治下的北方中国传播开来，必然会给旧学风造成巨大冲击。事实上，随着理学的传播，北方的学术空气也为之一变。一些具有探索精神的知识分子，开始摒弃旧儒学而转向程朱理学。其中，许衡是最早的代表之一。许衡接受理学之前，已颇有名声。后来，他从姚枢那里获读并抄录了《伊川易传》、《四书集注》、《小学》、《或问》等书，回乡即劝导学生与自己一起改弦易辙，悉力研治理学：“昔所授受，殊孟浪也，今始闻进学之序。若必欲相从，当悉弃前日所学章句之习，从事于小学洒扫应对，以为进德之基，不然当求他师。众皆曰：唯。遂悉取向来简帙焚之，使无大小，皆自小学入。先生亦旦夕精诵不辍，笃志力行，以身先之。”（《考岁略》，《元朝名臣事略》卷八）许衡以一种欣喜之情接受理学，实现了由章句之学向义理之学的转变。另一代表人物刘因转向理学似乎更自然，可以说是水到渠成：“（刘因）初为经学，究训诂疏释之说，辄叹曰：‘圣人精义，殆不止此’。及得周、程、张、邵、朱、吕之书，一见能发其微，曰：‘我固谓当有是也。’”（《刘因传》，《元史》卷一七一）从许衡、刘因的转变，可以看出元初理学发展的大势。

总之，在元灭宋之前，理学已在北方得到较广泛的传播，不仅在知识界受到欢迎，而且有了首批信徒，从而为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通路。

公元1276年，元军攻陷南宋首都临安，统一了全国。从此，南北阻隔完全打通，学术文化交流不再受地域的限制，北方理学与南方理学获得了同步发展的机会，开始步入创立具有自己特色的独立学派的阶段。

元代理学独立学派的形成，有两个主要标志：

一是建立了各自的学问师承体系，并且产生出有影响的代表人物。

北方第一批接受赵复理学思想的学者之一许衡，以主张行汉法著称，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信用，中统、至元初，一度出任中书左丞、数度担任国子祭酒。至元八年（1271），许衡以集贤大学士任国子祭酒，请征十二名弟子为斋长，建立了一套教学秩序，以理学教授弟子。史称许衡“乐育英才，而教胄子”。他为元王朝培养了一批治国人才，“数十年间，彬彬然号称名卿士大夫者，皆出其门下”（《许鲁斋集》卷六）。许衡高弟耶律有尚于至元二十四年（1287）出任国子祭酒，其教法一尊许衡之旧，成效颇为显著，“儒风为之丕振”（《元史》卷一七四）。许衡的另一位弟子姚燧，也“由穷理致知，反躬实践，为世名儒”（同上）。许衡所创立的鲁斋学派，为北方理学大宗，其影响及于有元一代，而许衡本人则被称为元代理学宗师。差不多同时，刘因也创立了自己的学派，称为静修学派，有安熙、苏天爵等一传和再传弟子递相授受。鲁斋学派、静修学派与北山学派（金履祥、许谦）、草庐学派（吴澄）南北呼应，成为带有不同色彩的元代理学的重要学派。

二是形成具有独特风格和创新见解的思想体系。

由于时代条件、个人遭遇和学术素养的不同，不同的学者所创立的思想体系，特别是那些成熟的理论体系，通常总具有不同的风格和特异的内容。元初许衡和刘因所创立的学派也具备这种特点。许衡是在元亡金以后接受理学思想，并在宋元鼎革时期开始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的。在深刻的社会危机面前，许衡重视“行道”，力图使理学发挥承续中原诸夏文化传统的社会功能。因此，在许衡的理学思想中，首先表现出来的是经世致用的特点，他主张元统治者入主中原后应行汉法，即推行儒家政治。其次，鉴于战乱中社会道德水准的普遍降低，尤其是蒙古贵族所表现出来的

极度的贪欲，许衡特别重视道德践履之学，强调治心之术的重要。因此，其学风趋向于“简易”。这样，许衡就建立起一个以践履之学为核心、具有经世致用性质的理学思想体系。刘因与许衡有所不同，提倡“尊道”。他或许认为在元统治下的政治和学术终不可为，因而长期过着隐逸生活。他所要建立的是一个兼取北宋周程张邵和南宋朱熹各家之长，“极其大，尽其精，而贯之以正”的理学体系。

总之，宋元鼎革成为元代理学发展的重要契机，至13世纪末、14世纪初，元代重要理学学派业已形成，实际上在学术思想领域已处于领先地位。程朱理学已接近立为官学了。任何一种理论对于某一社会的实现程度，取决于这种理论满足这个社会的需要的大小。程朱理学在元代前期能够获得传播和发展，表明它至少在这时还是一种具有生命力的学说。

程朱理学正式立为官学，是在元仁宗统治期间。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年青时以“通贯经史，善论古今治乱”的汉族名儒李孟为师，受过儒学思想的熏陶，深知儒术“握持纲常”，有助于维护君主专制统治。皇庆二年（1313），仁宗接受李孟关于“科举得人为盛”的建议，决意实行科举，命程钜夫草《行科举诏》，于十一月颁行。诏书说：“举人宜以德行为首，试艺则以经术为先，词章次之。浮华过实，朕所不取。”规定考试程式，“明经、经疑二问，《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并用朱氏（熹）《章句集注》”；经义“《诗》以朱氏为主，《尚书》以蔡氏（沈）为主，《周易》以程氏（颐）、朱氏为主”。诏书称科举的目的是“经明行修，庶得真儒之用；风移俗易，益臻至治之隆。”（《科举》一，《元史》卷八一）并且于延祐二年（1315）和五年（1318）通过廷试，共得进士106人。元仁宗皇庆二年，还决定“以宋儒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司马光、朱熹、张栻、吕祖谦及故中书左

丞许衡从祀孔子庙庭。”（《仁宗纪一》，《元史》卷二四）这样，在汉族知识分子的倡议和元王朝最高统治者的支持下，程朱理学终于登上了官方哲学的宝座，成为元代社会占支配地位的统治思想。

元代理学一旦被奉为官方哲学而具有了权威性质，它的发展就趋于停滞了。有一点需要指出，元代官方只尊奉程朱理学，至于陆九渊心学则在排斥之列。元仁宗皇庆元年（1312），吴澄任国子司业，因对学者说：“朱子于‘道问学’之功居多，而陆子静以‘尊德性’为主。问学不本于德性，则其弊必偏于言语训释之末，故学必以德性为本，庶几得之。”遂遭非议，认为吴澄提倡陆学，是与许衡唱反调，“非许氏尊信朱子本意”。弄得吴澄只好辞职，“一夕谢去”（《科举学校之制》，《元史纪事本末》卷八）。正因为官方崇奉程朱理学而排拒陆学，所以，元代后期的学术空气就不如前期那样活跃，而比较沉闷。不过，陆学虽然为官方学术所排斥，在民间还是继续流传。尤其是在江西和浙东地区，有刘壎、陈苑和赵偕等学者努力倡明陆学，与程朱理学抗争。同时，元代后期，不少理学家也逐渐认识到朱熹理学自身所存在的理论上的缺陷。例如，虞集认为，朱熹中年以后，已自觉“向来说话，有大支离处”，愈来愈讲求“切己反求之功”（《跋朱先生答陆先生书》，《道园学古录》卷四〇）。并且指出了元代许衡之学在流传过程中产生了流弊，“文正没，后之随声附影者，谓修辞申义为玩物而苟且于文章，谓辨疑答问为躐等而姑固其师长，谓无所献为为涵养德性，谓深中厚貌为变化气质，外以聒瞽天下之耳目，内以蛊晦学者之心思”。而这种流弊又与许衡之学本身的缺陷有关，“鲁斋所见，只具粗迹，故一世靡然而从之也。”（《静修学案》引，《宋元学案》卷九一）元代后期理学的重要代表郑玉，更是看清了朱陆双方均各有所长，“陆子之质高明，故好简易；朱子之质笃实，故

好邃密。”又各有所短，“陆氏之学，其流弊也，如释子之谈空说妙，工于卤莽灭裂，而不能尽夫致知之功。朱子之学，其流弊也，如俗儒之寻行数墨，至于颓惰委靡，而无以收其力行之效。”（《送葛子熙之武昌学录序》，《师山文集》卷三）虽然元代后期理学家都想兼取朱陆之所长，而避其所短，却终究未能建立起一个超越朱陆二家的新的思想体系。他们至多只是指出了一个可能的心学发展方向，并在自己的理论体系中增添了某些心学因素。至于建构新的理论体系的任务，只能俟诸继元代而起的明代学者去完成。从这个意义上说，元代理学正是由宋代理学向明代心学过渡的中间环节。